

研究論文

流動生活中的線上社區： 中國新生代農村移民 社交媒體使用的人類學研究

王心遠

摘要

本研究基於2013年至2014年之間，位於中國浙江的一個工業小鎮T鎮¹所進行的15個月的人類學民族誌研究。研究關注中國農村移民的社交媒體使用，並以此為切入口探討社交媒體的社會影響與當代中國的諸多變革。基於線上與線下結合的田野調查，本篇論文集集中討論新生代農村移民如何在「流動」的日常生活中建構社區認同，同時，新的人際交往與傳播模式是如何在社交媒體的使用中形成。研究發現，大量的農村移民在流動遷徙過程中面臨著人際交往危機與認同危機。在這一背景下，社交媒體為農村移民提供了一個相較於線下生活更為穩定、更為理想的社交平台。依託於社交媒體的線上社區，已經成為了農村移民日常中極為重要的新的居所。新生代農村移民的社交媒體使用是「網絡個人主義」的新詮釋。

關鍵詞：社交媒體、社會網絡、線上社區、流動人口、現代化

王心遠，倫敦大學學院人類學系博士後研究員。研究興趣：數碼人類學、互聯網、移民、當代中國、老齡化社會。電郵：xinyuan.wang.11@ucl.ac.uk
論文投稿日期：2017年2月7日。論文接受日期：2017年7月12日。

Research Article

Online Community in the “Floating Life”: 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among the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Rural Migrants

Xinyuan WANG

Abstract

Based on a 15-month (2013–2014) ethnographical study that was conducted in a small factory town in Zhejiang province, China, this project explores the daily use of social media among the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rural migrants as well as the social effects of social media and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a. Drawing from field work conducted both offline and onlin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in the floating life of Chinese rural migrants and the ways new social relations and communication patterns develop using social media. In their “floating life” of rural-to-urban migration, rural migrants face crises in terms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nd the sense of belonging. The findings showed that by using social media, these migrants created a relatively stable and ideal social life. Their online community had become an essential part—a new “dwelling place”—of the migrants’ lives. The social media use among the new generation of rural migrants is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networked individualism.”

Xinyuan WANG (Post-doc Researcher).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Research interests: digital anthropology, the Internet, migratio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ageing society.

Online Community in the “Floating Life”

Keywords: social media, social network, online community, floating population, modernity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Wang, X. (2018). Online community in the “floating life”: 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among the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rural migrants. *Communication & Society*, 44, 151–180.

致謝

本研究由歐盟研究基金會 (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 所支持 (編號 : ERC grant 2011-AdG-295486 Socnet) 。

研究背景與研究問題

社交媒體在全球範圍的廣泛使用，並不意味著全球同質化。越來越多的社交媒體研究不再滿足於從宏觀層面理解新媒體所帶來的社會變革，而從文化多元與相對的角度，考察不同社會與不同人群對社交媒體的使用並追溯其深層原因。同時，人類學研究需要為那些在現代化或其他類似敘述中被邊緣化的人群發聲(Horst & Miller, 2012)。本研究²的研究問題的是當代中國新生代農村移民的社交媒體使用，田野調查點是位於中國浙江的工業小鎮T鎮，T鎮的工業化密集發生在近十年，³2014年6萬2千居民中，近三分之二的居民為「流動人口」，其中年齡在16至25歲者佔大多數，為新生代農村移民。⁴2012年，中國農村移民的平均年齡為28歲，超過半數以上的人口出生於1980年之後，其中約75%的人口在20歲之前離開家鄉進入城鎮「打工」(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流動人口司，2013)。這一全國數據與T鎮農村移民的年齡分布狀況基本相符。中國農村移民構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人口遷徙(Chan, 2013)——2015年，約2億7千7百萬的農村勞動人口脫離農業生產，在中國經濟發達地區的城市和工業鎮，從事工業與服務業(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2016)。目前，關於「流動人口」科技使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線城市」(Qiu, 2009; Wallis, 2013; Wu et al., 2014)。然而，近半數(47%)的農村移民實際上工作和生活在中小型的城鎮(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流動人口司，2013)。T鎮農村移民的研究，旨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現有相關研究的偏重。

長期以來，有關科技的研究傾向於把科技視為一個獨立於社會文化背景的中立媒介，往往集中討論科技的功能性與實用性，以及在這一層面科技與社會的關係(Misa et al., 2004)。然而，互聯網時代的科技無所不在地鑲嵌在所有社會交往之中，「科技」與「社會」都已不再是既定的概念。本研究繼承「科技的社會型塑」(social shaping of technology)的研究視角，既充分認識到人的能動性，以及人在社會活動中對科技的創造性使用，又充分認識科技可供性(affordance)所具有的社會效能(Baym, 2010)。視「科技」與「人」的關係為一種相互型塑，辯證而動態的關係。

社會網絡分析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為本文的討論提供了理論框架。在對原始社會的研究中，人類學家 Radcliffe-Brown 用「特定時刻所有個體的社會關係總和」(Radcliffe-Brown, 1940, p. 55) 來定義社會結構，認為實際存在的社會網絡規範著小範圍社區 (如部落、鄉村等) 內部成員的行為。然而，相較於原始社會，現代社會的人際關係，組織和制度都要複雜得多。Wellman 把「社會網絡」視為是聯結行動者 (actor) 的一系列社會關係，其相對穩定的模式構成了社會結構，網絡的行動者 (actor) 既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不同類型的人的集合體 (Wellman, 1988)。同時，對社會網絡「嵌入性」(embeddeness) 的討論 (Nee & Ingram, 1998) 不僅揭示了社會網絡的普遍存在，也指出了社會網絡突破制度框限的潛力。「網絡化個人主義」(networked individualism) 提出互聯網時代個體運行著一個個分離的、獨特的個人化的關係網絡，社會交往的單元由群體變為了負載著多元、交叉的社會關係網絡的個體，這些鬆散動態的新型網狀結構打破了前互聯網時代較為緊致的社會結構，使個人成為交往的核心 (Rainie & Wellman, 2012)。

互聯網革命 (internet revolution)、移動革命 (mobile revolution) 與社交媒體革命 (social networking revolution)，被並稱為互聯網時代深刻影響人類社會的三大革命，這三大革命給賦予了個人前所未有的傳播與處理能力，是「網絡化個人主義」科技基礎 (Rainie & Wellman, 2012)。隨著經濟型智能手機的普及，這三大革命也已經在中國新生代農村移民的日常生活中發生，在中國城鄉二元的特殊語境中，流動人口社交媒體使用的研究帶來了哪些對當代中國社會網絡的認識？在 T 鎮的田野調查是否觀察到了「網絡化個人主義」的發展趨勢？帶著這些問題，本文著重分析通過社交媒體實現的人際互動，並引入「線上社區」的概念重新審視社交媒體在新生代農村移民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並分析從線下到線上的遷移所帶來的社會網絡重塑與重組。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4期(2018)

文獻探討

線上社區

Putnam在《獨自打保齡》(*Bowling Alone*)中將美國社會從1960年代以來社會資本萎縮與公民社會的衰退，一定程度上歸罪於媒體科技對傳統的具有地理「鄰近性」(proximity)社區的解構(Putnam, 2000)——因為有了大眾媒體，人們較少參加公共集會、俱樂部、社區活動等。Putnam對「社區」的理解是懷舊的，的確，在傳統人類學研究中「社區」多指小範圍地理區域內，由具有相對同質性人群所組成的社會單元(Barnard & Spencer, 2009, p. 142)。在大眾傳播時代之前，地理鄰近性是「社區」形成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因為在同一當地環境中，人群更有可能共同面臨相似的問題，採取聯合行動，共同承擔風險，並在此基礎上建構社區共同體的社會心理(Minar & Greer, 2007[1969])。然而，傳播技術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正如Anderson在《想像的社區》(*Imagined Communities*)一書中就已經指出的，大眾傳媒對國家與地區意識的產生與發展起到的重要作用，社區的形成與維繫需要通過由科技中介的傳播(Anderson, 1991)。

從大眾傳媒到互聯網技術，科技使超越地理局限而存在的社區成為可能，互聯網的研究也一直視「社區」為核心議題之一(Lesser et al., 2009)。本文將「線上社區」定義為：在互聯網技術中介下，建立在共同情感、興趣、利益與目標基礎之上的社群集合體，其成員身份可以與線下的日常生活身份相符，也可以是虛構的角色扮演，或兩者兼有(Dennis, Poothari & Natarajan, 1998; Rheingold, 1993, p. 5; Ridings et al., 2002, p. 273)。「線上社區」也被稱為「虛擬社區」(virtual community)(Rheingold, 1993)。然而，「虛擬社區」中的「虛擬」並非「真實」的反面：「非物理」技術與超越地理實在並不意味著社區形態的「非真實」，成員身份的虛構也並不意味著社交互動與社區認同的「非真實」(Breslow & Mousoutzanis, 2012)。

「線上社區」能有效提供了從「情感支持」到「信息支持」(Walther & boyd, 2002; White & Dorman, 2001)的各類社會支持，支持並維繫一定的社會規範與社會價值，同時具有接納陌生人的機制(Wellman, 1999)。

同時，當人們從線上社區提供與獲得社會支持時，參與雙方的社會資本都得以增加 (Baym, 2010)。

社交媒體的廣泛使用，開創了「線上社區」的新形式。傳統「線上社區」，如網上論壇的重要特徵是社區有其明顯的邊界，社區活動都在這一明確的邊界內進行，人際傳播常常在多對多的環境中進行 (彭蘭, 2009)。而在社交媒體的傳播模式下，「線上社區」的形成是通過人與人關係的紐帶，以網絡化的個人為中心形成的。建構「線上社區」是社交媒體使用者添加好友的動機之一 (Fono & Raynes-Goldie, 2006)，人們對「線上社區」體驗與定義來自於不斷的線上互動 (Fernback, 2007)。

對許多社交媒體使用者來說，「線上社區」的社會生活已經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 (Chambers, 2013)。社交媒體不僅僅在「弱關係」(Granovetter, 1973) 中使用，同時也充分應用於家庭及其他親密社會關係的個人傳播中 (Miller et al., 2016)。社交媒體逐漸囊括了一切可能的社交關係。「可調控社交」(scalable sociality) 這一概念，從社交形態與傳播方式的角度，定義社交媒體。在社交媒體上，人們既可以進行一對一對話，也可以實現一對多的傳播；既可以建小群組，也可以形成社區，社交媒體作為「可調控社交」，提供了社會交往與傳播情境的諸多可能 (Miller et al., 2016, p. 3)。

中國「流動人口」與數碼通訊技術研究

大量關於移民數碼通訊技術的研究表明在數碼通訊技術的中介下，移民人口與遷出地的社交關係得以維繫並發展 (Fortunati et al., 2012; Madianou & Miller, 2012; Miller & Horst, 2006)。邱林川通過對中國勞工階層手機使用的研究提出了「信息中層」(information have-less) 的概念 (Qiu, 2009)。指出中低端移動通訊信息技術的普及使得原本被排斥在互聯網之外的社會中下層人群得以進入信息社會。「信息中層」不僅進入方式不同，其信息訴求和對信息技術的應用也呈現出與城市中產階級不同的特徵。關於中國農村互聯網發展的研究發現，農村移民作為農村人口最早接觸都市生活方式，使用手機及互聯網的族群，通過社會交往與個人傳播的形式，極大促進了移動通訊技術在中國農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4期(2018)

村的擴散 (Oreglia, 2014)。Wallis 通過對北京的女性農村移民的手機使用研究提出了「科技移動力」(technomobility) 的概念，即手機打破了對農村移民的空間限制，並為其提供了維繫並擴大社會交往的重要平台 (Wallis, 2013)。同時，手機的擁有與使用也成為農村移民進入都市現代化場域的符號資本 (Wallis, 2013, p. 179)。

手機與社交媒體的廣泛使用是新媒體賦權 (陳韻博, 2010, 2011; 周葆華、呂舒寧, 2011)，手機的普遍使用幫助農村移民與留守在農村的家人保持聯繫 (Law & Peng, 2006; Peng, 2012)，並擴大了業緣關係 (田阡, 2012; Ngan & Ma, 2008; Yang, 2012)。人們在此過程中尋求身份認同，社會認同，獲取了社會資本，實現個人發展 (王錫苓、李笑欣, 2015; 鄭松泰, 2010)。同時借助手機與社交媒體的信息獲取正逐漸改變著農村移民對兩性關係的看法，性別平等的意識得到了啟蒙 (李智、楊子, 2015; Chu & Yang, 2006; Lin & Tong, 2012)。包括社交媒體在內的移動互聯網通訊技術，也日益成為了新生代流動人口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信息與娛樂來源 (吳麟, 2015; 鄭欣、王悅, 2014)，社交媒體使用有利於健康知識的傳播與普及 (鄒超英等, 2016)。雖然，大多數關於農村移民數碼媒體使用的研究，依然將重點放在了媒體的技術能力上，而非人的能動性上 (Yang, 2009)，這些研究記錄分析了農村移民數碼科技能力及其社會資本，為後續研究奠定良好基礎。

對新生代農村移民社交媒體日常使用的人類學民族誌式的實證研究相對有限。其中，Liu 的研究呈現了移動互聯網為維持少數民族 (佤族) 內部凝聚力提供了技術支持和互動場域，在 QQ 上的互動看似虛擬實則扎根於線下的民族身份認同，線上社交模式由個人自由意志與族群結構所共同型塑 (Liu, 2015)。對 QQ「同鄉群」的研究則發現，農村移民對 QQ「同鄉群」使用之初的情感型的信任衝動，在經歷經濟利益受損、群組內交往質量不高後而逐漸消退，QQ「同鄉群」面臨著社區融合的艱巨過程 (高崇、楊伯濂, 2014, 2015)。

研究方法與田野調查點基本情況

本研究採取人類學民族誌研究方法，對研究對象的日常生活與傳

播行為進行線下與線上的「參與觀察」，並輔以問卷調查與訪談方法。民族誌研究要求研究者長期居住在當地，廣泛認識當地居民，並與其成為熟人與朋友，從當地人的視角書寫民族誌。這一方法試圖降低受訪者在「被觀察」狀態下的不自然狀態，從而減少主觀期許、社會規範與禁忌、溝通意願、表達能力，以及相互信任等因素帶來的幹擾。在2013年至2014年間，研究者在T鎮進行了為期15個月的田野調查，在上海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深入訪談，旨在將上海居民作為對照組，與小鎮農村移民社交媒體進行部分維度的比照。⁵在田野調查期間共結識了491位居住並生活在T鎮農村移民，⁶其中核心受訪者⁷為215人(表一)。核心受訪者的平均年齡為24歲，女性44%，男性56%。平均教育水平為7.5年義務教育(47%低於初中教育水平)，平均月收入為3,200人民幣，平均社交媒體使用時間為6.5年，智能手機使用率98%，智能手機平均使用時間2年。

表一 215位核心受訪人職業、性別及平均年齡分布

職業	總比	女	男	平均年齡
工廠工人	72%	45%	55%	23
餐飲業	7%	80%	20%	23.4
理發店學徒	7%	33%	67%	18.7
建築工人	5%	9%	91%	37.5
門衛 / 保安	3%	0%	100%	35
商店店員	2%	75%	25%	25.8
司機	2%	25%	75%	30.8
性工作者	1%	100%	0%	22.5
待業	1%	50%	50%	19.5

表二 215位核心受訪人職業、性別及平均年齡分布

時間(樣本數)	QQ使用者	QQ活躍用戶	微信使用者	微信活躍用戶
2013年6月 (n = 205)	96%	85%	19%	11%
2014年8月 (n = 119)	98%	80%	65%	45%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4期(2018)

自2013年初開始，在T鎮中低端智能手機市場基本由農村移民推動。⁸2014年約80%的移民擁有智能手機，在16–25歲的人群中，智能手機幾乎人手一部。⁹相較於騰訊QQ，微信是新的社交媒體。作為以智能手機為主要終端的社交媒體應用，微信的流行始於2012年年末廉價智能手機在農村移民中逐漸普及之後。許多新生代農村移民從2013年開始使用微信。如表二¹⁰所示，在2013年至2014年間中對微信的使用雖然出現了迅速增長，但QQ依然是主要活躍社交媒體，對QQ的使用集中在即時通訊與QQ空間。

本研究中，線上的田野調查與線下的田野調查一同展開。在保持線下互動的同時，研究者與受訪者成為社交媒體(QQ或者微信)上的聯繫人，並通過社交媒體平台進行一對一，或者一對多(群聊天)溝通。同時共詳細分析了461位受訪者¹¹的社交媒體個人主頁的內容。

社交媒體既是研究對象，也是線上田野調查的重要場域。在工業鎮的線下環境中，一對一交流的場所十分有限，旁聽者在場的環境是常態。因此，面對面的交流較少涉及到個人情感與想法，社交媒體也為研究提供了較為私密的溝通平台。在線上的「參與觀察」則為研究提供了更為深入的視角及重要的信息。

研究發現與案例分析

研究發現以案例分析的形式展開。文中所討論的案例均為在民族誌大量類似案例中具有代表性的個案。第一部分勾勒新生代農村移民日常生活的社交形態與訴求；第二、第三部分在第一部分的語境中，深入分析社交媒體上的各類社交關係，討論社交媒體在新生代農村移民建構自身認同與社會網絡時所起到的作用；第四部分在QQ空間案例的基礎上就線上社區與個人為中心的社會網絡發展進一步展開討論。

新生代農村移民的社交困境

在中國鄉土社區結構中，人際關係的重要特點為緊密聯繫、互相依靠，「關係」不僅指的是人際紐帶，也是政治經濟生活的起點與訴求

(Kipnis, 1997; Skinner, 1964)。對打工者來說，離開鄉村意味著走出傳統鄉土社區。對新生代農村移民來說，「出來打工」更被視為「成人禮」(rites of passage) (Fang, 2011)，在很多情況下「出來開眼界」從而實現自身現代化的渴望成為了進入城鎮的主要推動力之一(王春光，2001；Fan & Chen, 2014)。之前的研究發現從農村社會到城市陌生人社會的遷移過程中，出現了「準社區」(王春光，1995)、「跨越邊界的社區」(項飈，2000)，這些社會空間儘管發生在城鎮空間，但實質上還是以血緣、地緣為基礎的鄉土社會關係網絡。T鎮75%的打工者與至少一位家人共同居住，獨居率僅為5%，這一狀況也與中國農村移民的整體狀況相符。¹²

23歲的工人華子和家人住在一起，在T鎮有近三十名遠親和老鄉。華子說：「我也想一個人住，但我們出來打工也是沒辦法，一起住省錢，而且也有個照應……更何況，這邊人也不會把妳當自己人，我們就是外地人。」華子說出了許多年輕人的苦衷。他們依附於城鎮中的鄉村關係網，更多的是出於生活成本的考量與面對社會區隔迫不得已的妥協。T鎮的社會區隔十分明顯：72%的農村移民與T鎮原有的當地居民的社會交往僅限於功能性社交層面，即店主/店員；店主/顧客；房東/房客；以及工廠管理人員/工人之間的必要交往。¹³這樣的區隔從小學就已經開始，在鎮上唯一的小學約85%的學生來自農村移民家庭。每個年級設有一個「本地班」與四個「外地班」。「本地班」只錄取來自當地戶口居民家庭的孩子，並配備有優勢教師資源。在中國城鄉二元社會結構中，農村移民不僅因為戶籍制度難以在移居地獲得永久居民身份以及相關的社會醫療保障(Rofel, 1999)，同時長期以來遭受到不同程度的不平等待遇，社會歧視與社會區隔(Fan & Chen, 2014)，被視為阻礙中國現代化發展的人口劣勢而長期處於現代化邊緣(Murphy, 2004)。新生代移民因為比上輩們更迫切期待融入都市的現代化生活(Lan, 2014)，所以對城鄉不平等，社會區隔與歧視，更容易產生挫折感與孤獨感(Li & Tian, 2010)。

此外，由於高流動性，同是「外地人」之間建立穩定社會關係的可能性也十分有限，人們普遍對於恰好是一家工廠打工，或恰好住在一棟樓的，具有近地性的他人不抱有建立長期社交關係的期待。201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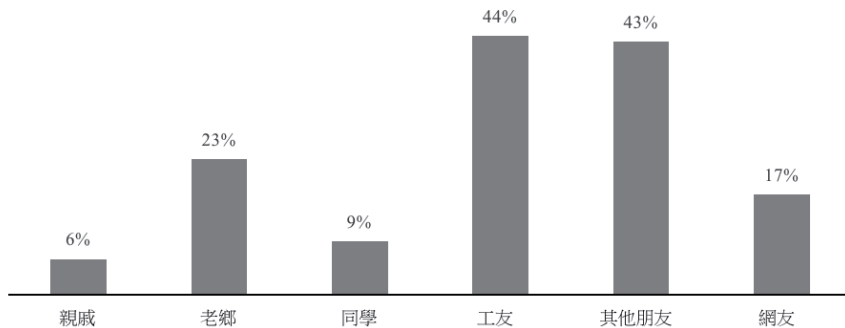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4期(2018)

開始微信開始普及，許多年輕人表示在工作生活中新認識的人一般會加微信，與此同時，「清理聯繫人」的微信群發信息也開始流行起來。與上海的對照組相比，這一類群發信息的流行程度在農村移民中尤具顯著性：在377位T鎮的農村移民人口中，有近80%的人發送或收到過一次類似的信息。而在上海居民中，這一比例僅為約12%。在農村移民中如此普遍的「清理聯繫人」現象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對流動過程中社交關係的不安全感。總體來說，新生代農村移民在追求個人發展中與鄉村社區關係有著「想離又無法離」的矛盾心理，同時，對城市近地空間新的關係又有著不確定性焦慮。這樣的社交困境是理解社交媒體社交網絡的重要語境。

社交媒體上血緣地緣關係的式微

表三為T鎮農村移民的QQ聯繫人分布。¹⁶從表三可見，QQ上集中了各類人際關係，但大量的QQ聯繫人並非來自親緣或地緣關係。誠然，在人際關係中具有親緣與地緣關係的聯繫人在絕對數目上本身有限，因此表三中的比例值並不充分，田野調查中對農村移民日常社交媒體使用的觀察更具說明力。

表三 T鎮農村移民的QQ聯繫人分布 (n = 105)



「同學」在農村移民的QQ上卻不具有顯著性——在上海的對照組中，¹⁷「同學」在社交媒體聯繫人的比重為36%。在T鎮超過60%的

16–25歲的打工者都曾是「留守兒童」，他們在14–17歲之間輟學，離開農村進入工廠。「同學」比重的偏低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農村移民接受學校教育的時間低於同齡人平均水平。「同學」在中國傳統人際關係中十分被強調，是在親緣關係外社會支持重要的關係類別 (Fried, 1969; Smart, 1999)，學校是個人社會化過程中重要的場域，也是相對穩定的環境 (Bucholtz, 2002)。然而，在同齡人還在學校接受教育，習得社會交往能力的時候，新生代農民工已經投身於充滿流動與不確定性的資本環境。學校教育的大大縮短對打工者來說不僅是教育的缺失，同時也意味著社會化過程中重要階段與社會網絡建構中重要元素的流失。

75%的年輕打工者在QQ上沒有任何長輩的親戚，大多數在QQ上的「親戚」是親戚中的平輩或者晚輩。20歲女工小玉曾解釋道：「還好那些長輩不會用QQ，要不然我QQ上說的東西，都被他們知道，可要煩死了」。25歲的餐廳服務員麗雪曾因為親戚關閉了自己的QQ空間，麗雪的叔叔是她的QQ好友，麗雪在QQ空間上關於感情問題的抱怨被叔叔小題大做傳到她父母耳中，結果麗雪差點被父母「騙」回老家相親。在經歷了QQ「泄密」之後，麗雪第一時間關閉了所有人對QQ空間的訪問權限，重新設置了大部分親戚的訪問權限。年輕的打工者們對親戚的態度較為矛盾，一方面，他們深知親戚是核心社會關係，其構成的支持網往往在外出打工的初期發揮重要作用，例如61%的年輕人表示他們的第一份工作是通過親戚介紹的。¹⁸另一方面，親戚又代表了傳統社區緊密的約束。年輕人迫切希望脫離傳統社區的束縛，體驗自由的生活，因而試圖在城鎮空間中獲得不受鄉村社區凝視的自由，努力使社交媒體成為不受長輩監視，擁有相對較大自由的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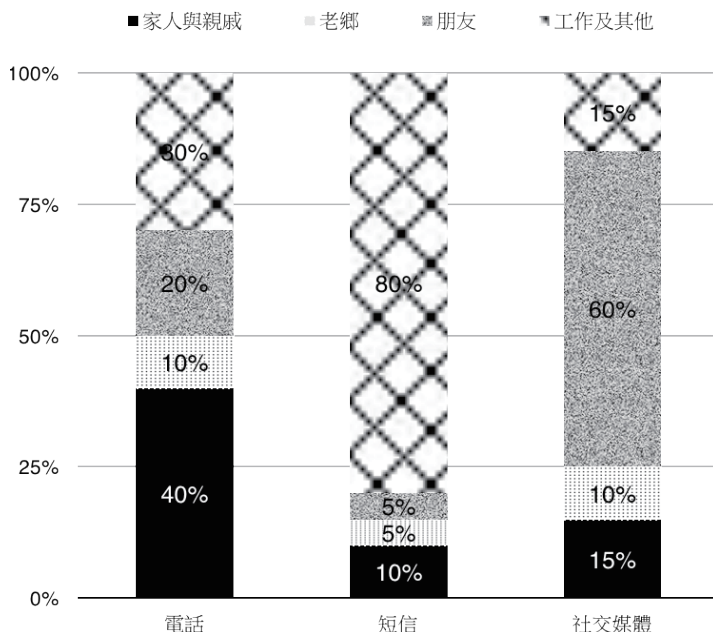
對「老鄉」的態度與對「親戚」的態度有著類似之處。老鄉是在找工作過程中非常重要的人際關係和社會資源。但老鄉並非是QQ上聯繫的活躍人群，其存在更多的是為了留有「保持聯繫的可能」。在工廠廚師小陳的QQ上至今仍保留了50多位「老鄉」，但除了至今仍和小陳常常通電話，並在附近鎮上打工的華東之外，其餘的老鄉都已經有近一年沒有在QQ上聯絡了，最近的一次通聯記錄是年初過春節期間的互相問候。小陳這樣解釋道：「生活不太一樣了，話題就沒有了」。小陳15歲就離開江西農村，進城打工15年來，輾轉江浙十幾個不同的鎮，做過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4期(2018)

門衛、保安、水泥工、搬運工、小飯店廚師。小陳覺得這些是不在一起生活的老鄉所無法理解的。打工者對老鄉冷落另一個原因是老鄉間功利性質的交往壓抑了交往願望。23歲的工人誌豪坦言「我在QQ上最怕看到哪個老鄉突然問我最近好不好，沒有事他們是不會來找妳的，找妳無非就是借錢問找妳幫忙什麼的，說實話出來這麼多年老鄉的感情早就沒什麼了。」

通過智能手機，每一位受訪者都至少有三種與不同類別聯繫人聯絡的方式：電話、短信、與社交媒體(QQ或微信)。如表四¹⁹所示，親緣和地緣關係的聯繫更多地使用了電話，不少人購買了電信公司推出的針對打工者的「親情網」或「家鄉網」的電話資費套餐，在工作上的聯繫也通過同一地區「虛擬網」進行電話溝通。短信的使用越來越被社交媒體取代，大多數人通過短信接收服務功能性信息。而社交媒體主要用於與非親緣與地緣的社會關係。

表四 農村移民的主要通訊對象在以智能手機為載體的三種通訊方式中所佔比重 (n = 100)



註：受訪者就四種主要通訊對象類別(家人與親戚、老鄉、朋友、工作及其他)在以智能手機為載體的三種通訊途徑(電話、短信、社交媒體)中分別所佔的百分比做出大致的估計。

人類學研究提出了的「複媒體」(polymedia) 概念用以解釋在低成本通訊環境中人的媒介選擇。在「複媒體」時代，人對通訊媒體的選擇是多樣的，並且越來越不依附於科技接入 (access) 與資費 (cost) 的考量，個人對不同的通訊工具和方式的選擇實則代表在實際社交生活中對不同傳播對象的社交規範，期待與判斷 (Madianou & Miller, 2012)。社交媒體上親緣和地緣關係的有限存在，正體現了新生代農村移民的社交意願以及對傳播手段的選擇性使用。

表三中「工友」的比例很高，其高比例來自於工作通知群組，同時QQ也是「工友」互留的聯絡方式的首選，因為在流動過程中，手機號碼會變但QQ號不會變。「其他朋友」和「網友」指的是非血緣、地緣與業緣關係的聯繫人，關於這兩者的討論，在下節詳細展開。

社交媒體上「朋友」於現代化的社交關係的渴望

80%的上海受訪者從未在目前使用的社交媒體(微信)上添加過任何陌生人，如果是未曾謀面的人也基本是朋友推薦的朋友，類似於農村移民在QQ上認識的網友現象十分罕見。農村移民為何對隔絕於線下生活的線上聯繫人有著較高的溝通意願？

上文提及的小陳在面對面的交談中並不是一個善於言談的人，在QQ上，小陳共加入了七八個QQ群。在這些群裏，小陳儼然是個意見領袖。常常在晚飯後的好幾個小時裏，小陳只盯著手機屏幕，在三四個QQ群裏穿梭，留言評論並轉發觀看各類圖片，文章和視頻。小陳曾這樣聊起自己對這些QQ網友的感受：「我知不知道他們的名字有沒有見過面，其實也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有話聊，聊得來。這些人裏面有好多都是打工的。……有些時候手機放在那裏充電，我臨時走開，一會兒沒得看QQ，心裏還好像有什麼東西放不下，好像有什麼人在那裏等妳」。

比照小陳之前對「老鄉」的評價，QQ網友在他心中的顯得更為親切，他對這個群體的歸屬感也更強烈，在「流動」的生活中，他遠離家鄉，暫居的城鎮一直在變，鄰居、同事也常常更換，但QQ一直是一個穩定的地方，無論身在何處，在QQ上熟悉的陌生人似乎總「在那裏等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4期(2018)

妳」。在T鎮的日常交流中，「社區」一詞幾乎從未出現過，但人們反覆用各種樸實而具體的語言描述著在QQ上所體會的社區歸屬感。

T鎮QQ聯繫人的平均數量為325，²⁰而這個數字似乎低於在日常閒談中人們口中的QQ好友數量。許多年輕人往往回答：「我QQ上的好友多得數不清」；「QQ就是用來交朋友的啊」；或者「出來打工就是見世面多交朋友」。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一個共有心理，即QQ上的朋友越多越好，並且QQ上朋友數量的多寡是一個人是否習得城市生活方式的證據之一。23歲的劉冰是T鎮一家飯店的服務員。她對朋友的理解代表了不少年輕人的想法：「如果妳一直呆在老家，妳就不會知道朋友的重要性。但外面的世界是不同的；妳看城裏人都有很多朋友，也有很多機會認識新朋友」。

劉冰對朋友的理解是建立在和老家人際關係的比較中。「朋友」往往是一個無法歸類為「親戚」、「老鄉」、「同學」、「工友」的「其他」項，因此人們往往稱「其他朋友」。有研究表明，在中國社交關係中6.6%的人被用「朋友」稱呼；而在美國，「朋友」佔了社交關係中的67.8% (Ruan, 1993)。兩者的巨大差異表現了不同社會對「朋友」的定義與賦值。人類學研究也發現，在中國，定義社交關係時往往需要添加「額外」的身份信息，僅僅稱「朋友」被認為是無法提供確切的社交關係，即關係人之間社會交往的語境與背景不詳 (Smart, 1999)。在中國傳統的鄉土社會非親緣關係往往被認為具有較低的重要性，非親緣關係的人為了表示關係的極致親密程度則會付諸「結拜認親」的儀式 (Mann, 2000)。在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農業文明社會，「朋友」作為一種人際關係，在近代才逐漸獲得了重要性，工業化與現代化的進程，將人剝離了土地依附以及相關的社交關係，並投入到親緣關係與地緣關係之外的社交關係網之中 (Bell & Coleman, 1999)。正如劉冰所言，「如果妳一直呆在老家，妳就不會知道朋友的重要性」。

在QQ上有著不少網友的叉車司機李誌用「純」來形容自己和網友間的關係：「在QQ上就是說妳想說的。(網友)他們喜歡聽就聽，不喜歡也沒關係。常常在QQ上聊的都是真的欣賞妳這個人的。這種關係其實很純的，不是說因為妳錢多就喜歡妳，或者妳做大官就喜歡妳。他不管妳要錢不管妳要升官發財，都是普通人，沒有利害關係，很純的」。在

對中國人際關係的分析中，Hwang (1987) 提出了三種模式：「工具型」(instrumental tie)、「混合型」(mixed tie)、與「情感型」(expressive tie)。在QQ上類似「陌生人」的網友的互動是「脫景化」(de-contextualization) 的過程，這些QQ網友極少與具體的線下生活發生關係，因而「情感型」(expressive tie) 關係較不易發展為具有「利害關係」的「工具型」(instrumental tie) 關係。此外，處在社會底層的農村移民往往因為其身份而遭受歧視與區隔。而在QQ上，農村移民可以有選擇地暴露或保留自己的線下的社會身份，QQ聯繫人的同質化程度高於線下社會生活中的聯繫人(大多數農村移民的QQ網友也依然是有著類似經歷的人)，在同質人群中所承受的社會壓力與歧視相較小得多。曾經和李誌關係最為親密的工友，因為一次工傷的賠償分配不均而與李誌分道揚鑣。李誌在貴州老家的弟弟因為李誌在其結婚蓋新房時「包的紅包不夠大」而對李誌耿耿於懷。正如，T鎮上的「現代發廊」學徒小梁(16歲)2013年7月5日在QQ上更新的一條狀態：「人窮的時候，情又值幾個錢？」在田野調查中，研究者所親歷耳聞的各種因利益而頻發的關係破裂，更佐證了李誌為何為對沒有利害關係的QQ網友懷有更深的情感與期待。

「虛擬/真實」這對二元對立在電腦中介傳播(CMC)的研究中，一直以來，不斷被檢視(Markham, 1998; Breslow & Mousoutzanis, 2012)。這些研究所關注的重要問題之一，即「在數碼科技中介之下，人際交往是否產生了質的變化」。例如，大量對社交媒體Facebook的研究(Cocking & Matthew, 2000; Fröding & Peterson, 2012; Turkle, 2011)，質疑人際關係正在社交媒體的中介下變得虛幻，失去了真實性(authenticity)。而在李誌的案例中，「朋友」在看似虛擬的社交媒體的中介下，脫離了線下利益關係與社會結構的中介，獲得了主位(emic)感知中確實的真實性。「在科技應用之前，人際關係中不存在中介」是一個錯誤的想像，人際關係中一直以來都存在著各種社會規範性的中介(Miller et al., 2016, p. 102)。因此，「中介」與「真實性」之間沒有必然的聯繫，社交媒體改變了人際關係的中介的形式，人際關係不必然因為數碼中介而變得不真實。

許多年輕的打工者視交朋友為一種現代化的生活方式，並熱切渴望著農村—城市的移民能為這樣的社交需求提供可能的空間。然而，因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4期(2018)

為高流動性與普遍存在的社會區隔與歧視，年輕的農村移民實際上並無法在移民過程中的線下環境充分實現交朋友。這種在線下社交生活中無法實現的訴求，轉而在線上得到了滿足。在某種意義上說，社交媒體不僅是農村移民體驗「朋友」的有效空間，更是其發現「朋友」並重新認識「朋友」價值的現代化社區。

QQ空間與理想社區

QQ上超越傳統鄉村社區的社會關係構成了新的社會空間，這一空間為個體的公共形象管理與自我表達提供了新的場域。在之前對線上社區的研究中，QQ群是研究者關注的重點(高崇、楊伯濛，2014；2015)，而本研究發現，個人的社交媒體主頁，即QQ空間才是線上社區的實然形態。QQ老鄉群是研究者作為局外人可觀察到的形式上顯見的社會網絡，而QQ空間則是以個人為中心建構的社會網絡，是行動者主位視角出發理解和知覺中的社會網絡。

工人小玉是QQ空間使用的典型例子。19歲的小玉是流水線上女工，她的工作的訣竅是：「妳不要想事情就好，妳一用腦子，手就慢了，手慢了，就跟不上機器了。」小玉一個月中的29天，一天中醒著的9-10個小時都是在流水線結構性異化的場域中，自覺地在「不用腦子」的狀態下度過。在信息爆炸的時代，人的注意力尤其成為了一種稀缺資源(Davenport & Beck, 2001)，而每一位工廠工人都和小玉一樣面臨著「注意力赤字」——絕大多數時間，他們將自己的注意力投入於工廠生產，而作為個體的人極少得到外界的關注，他們是注意力的給予者，而非收穫者。

終於收工的小玉，一脫下工作手套，還沒走出廠區，就迫不及待地掏出手機查看QQ。此時的她是一天中最自信最快樂的模樣。在QQ上小玉有著不少愛慕者，每天總會收到一些關注。小玉和這些網友聊天時的語氣也和她線下說話的方式十分不同，QQ空間上的小玉彷彿就像是一個正在等待真愛出現的公主。2014年3月的一組婚紗模特的圖片更新中，小玉隨附了一段非原創文字：「我一生渴望，被人收藏好，妥善保存，細心安放，免我驚，免我哭，免我顛沛流離，免我無枝可

依，但我知，那人永不會回來」。這一類圖文在小玉名為「隨風飄逝」QQ空間上隨處可見。QQ空間中從未出現和T鎮有關，工廠流水線有關的任何圖文，更多的是華美服飾、度假勝地、美食甜品等圖片，這些圖片下載自網絡，又被小玉發布在了QQ空間上。

小玉的做法，在年輕農村移民中十分普遍。71%的年輕男性（16–35歲），及86%的年輕女性²¹都在QQ上發布過與線下差距巨大、又帶有強烈消費主義色彩的圖片。這些圖片精準地反映出這些年輕人所渴望的生活，或者說，他們眼中現代化生活該有的樣貌。在當代，現代化的生活方式是一種「富有想像力的刺激」（Crapanzano, 2004）。在農村—城市的遷移過程中，來自城市，大眾媒體與網絡的與「都市」、「消費」相關的圖像場景，不斷刺激著渴望實現個人發展現代化轉變的農村年輕人，並塑造著他們的渴望與想像。與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不同，中國的工業化幾乎與消費革命在同一個十年中開始，很難分清兩者孰先孰後（Croll, 2006）。而對中國的農村移民工人，即所謂的「農民工」，來說，在這一轉型中得到的是雙重新身份：工人與消費者。消費象徵衝破城鄉差異，階級格局的自由與希望（Croll, 2006）。而對於無成本複製數碼圖片的獲取，首先是最可及的一種消費。

僅看小玉的QQ空間，無人能夠想像她線下的居住空間。小玉全家五口人擠在兩間平房中生活，與另兩戶農村移民家庭共用衛生間。夏天在衛生間裏用塑料桶接水洗澡，冬天去公共浴室才能洗熱水澡。五歲的弟弟和父母一間房，這間房同時也是廚房，煤氣缸擺床頭，小電視機架床尾。小玉和九歲的妹妹住閣樓，閣樓其實是一家雜貨店的倉庫，騰出一點地方擺了張床外便沒有其他的家具。2014年一個夏日的傍晚，屋內的氣溫高達38度，即使有台小電扇也悶熱難忍，小玉正坐在床邊上捧著手機專心地為自己的QQ空間挑選新的「皮膚」（背景圖及配色）。過了好一會，她終於緩過神來，抬頭看了看汗如雨下的我正奮力驅趕蚊蟲，笑道：「手機外的生活很難熬吧！」

小玉不經意的笑談，指向了一個關鍵性的問題：何處是居所？在對Kampung地區爪哇勞工的研究中，人類學家Peacock（1968）分析了一個有趣的觀察。他發現在一種舞台劇Ludruk在勞工中十分盛行。該舞台劇經典的故事之一是一個出身卑微的農村女子，來到城市，最後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4期(2018)

通過自身努力和婚姻，躋身都市上流社會。Peacock指出，Ludruk之所以在勞工中得到如此巨大的歡迎是因其塑造、並讓觀眾參與了一個理想化、純化的現代化生活。Ludruk為勞工們「提供了一系列具有象徵意義的行為，這讓他們得以否認在Kampung的生活，並獲得在Kampung生活之外的幸福」(Peacock, 1968)。誠然，在數碼科技的支持下，QQ空間提供了比Ludruk劇場大得多的可能性與便捷。但Kampung的爪哇勞工對Ludruk舞台劇的參與，與T鎮的農村移民對QQ空間的使用，在邏輯上十分相似：舞台劇和QQ空間所提供的都是對現有生活維度的超越。QQ空間為新生代農村移民超越城鄉之際的社交困境提供了可能，在QQ空間裏的線上社區為個人實踐理想化的自我，構建了理想化社區。

結論與討論：社交媒體時代的中國農村移民的二度遷移

對於現代化與個人發展的渴望是農村年輕人離開農村進入城鎮的重要動因，然而，地理上的遷徙，並沒有自然帶來社交關係，傳播模式與個人身份的現代化轉型——只有在網上，他們似乎真正到達了他們所渴望的現代化社會。正是因為新生代的農村移民在線下的生活中經歷了社區的異化與社交困境，社交媒體所提供的可能性才得以最充分地表現出來。與農村到城鎮的遷徙同時發生，且一樣深刻的，是從線下到線上的「二度遷徙」(dual migration) (Wang, 2016)。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新生代農村移民是名副其實的「社交媒體人口」。線上社區在這一人群中的日常實踐，在線下不足的反觀下，顯得尤為充分與重要。然而，二度遷移並非僅僅存在於農村移民中。線下生活的缺乏與挫折固然是「二度遷徙」在農村移民中充分實現的重要原因，社交媒體日益成為當代人際傳播與社交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每一個社交媒體使用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實踐著從線下到線上的遷徙。線上社區是「真實」生活的一部分，社交媒體為個人提供了「可調控社交」的充分可能。

新生代中國農村移民對社交媒體的使用，呈現出與之前社交媒體與網上社區的研究發現頗為不同的特點。在本文案例中，對社交媒體

使用的核心訴求並非是在網上重建原有的社區，而是充分利用數碼科技所提供的可能性塑造了一個新的社區。新生代農村移民的社交媒體的使用是「網絡個人主義」的新詮釋。個人的QQ空間以及其相關的在線人際傳播是新生代農村移民對自我現代化發展期待的可視化空間，在這一線上社區所進行的社會交往的重要性超越了先賦的親緣與地緣關係，而是在社交關係現代化轉型中所獲得的新型關係（朋友）。這些新生代農村移民無法選擇自己的出生，無法選擇除進城打工外逃離農村的出路，也無法選擇在「流動」中暫居的空間；於是，他們選擇「住」在手機上的QQ空間裏，不僅因為「手機外的生活很難熬」，也因為在社交媒體上他們體會到了在線下生活境遇中所無法形成的社區歸屬感；在社交媒體上他們獲得線下生活所無法得到的注意力，並在那裏參與並實踐著現代化生活。

Saunders用「落腳城市」(arrival city)一詞來形容世界發展中國家城市中為農村移民提供基本準入門檻的「城中村」地區，或者城市「飛地」，並從全球化視角出發，預言這樣的地區將是全球城市化發展最大張力的所在，可以孕育人類新的文化與市場的繁榮，亦是暴力與衝突的溫床。簡言之，在下一個世代，人類社會的文明走向在很大程度上被全球城市化過程中，湧向落腳城市的人口洪流型塑著(Saunders, 2010)。30多年前的中國，既沒有我們今天意義上的「流動人口」，也沒有「新媒體」，這兩者幾乎在同一時間出現發展，並在相互影響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現有的樣貌。因而也只有從整體上同時理解「流動人口」與「社交媒體」才能充分把握這兩者動態中形成的特征。

T鎮與Saunders所描述的「落腳城市」一樣，具有「過渡性」，是當代中國在城市化過程中具有代表性的小鎮，其本身的身份正在經歷著農業到工業；從農村發展成為城市的過程。在T鎮這一「城鄉接合部」生活的農村移民也代表了中國廣大農村勞動人口大軍中近半數的人口。在中國存在著上千個如T鎮一樣的工業小鎮，聚居在此數以萬計的農村移民是當代中國現代化轉型的巨大變量。從線上到線下的遷移是這一時代變遷浪潮中的洶湧「暗流」。在「複媒體」環境中，社交媒體為農村移民提供了一個相較於線下生活更為穩定，更為理想的社交平台。這一看似「虛擬」的數字化平台，已經成為了農村移民日常中極為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4期(2018)

重要的場域，甚至成為了承載更多認同的居所與社區。費孝通研究中國傳統社會結構所提出的，如水波紋般從中心散開的同心圓差序格局描述的是相對穩定的社會結構，其內核是親緣關係(Fei, 1939)。在數碼科技的支持下，網絡個人主義的結構將個體能動性從緊密聯結的核心群體中釋放出來，這一富有張力的線上社區為新生代農村移民建構了在鄉村社區和城市陌生人社會之間的「落腳城市」。理解「二度遷徙」背後的原因與訴求幫助我們理解個體與群體是如何應對與理解當代中國的現代化轉型，同時數碼科技在這一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對T鎮新生代農村移民的人類學研究是一個具體樣本的深入分析，其觀察與結論僅在一定範圍內具有代表性，無法全面代表分布在中國各個省份、不同市縣數目龐大的農村移民群體。性別、年齡、移居地、遷出地、教育水平、職業選擇、收入水平、家庭關係等一系列複雜變量都深刻影響著農村移民的社交媒體使用及其影響。人類學研究本身具有的數據局限，今後可以通過與量化研究更有機而深入的結合，取長補短，實現「點」與「面」的平衡。本研究中所採用的量化研究方法依然十分有限與基礎，要真正實現和「大數據」的「互文」，則需要多點民族誌比較研究，這也是未來相關研究可以更多著墨的地方。

註釋

- 1 根據歐盟研究基金會研倫理標準，研究中具體研究地點(省份及大城市除外)以及具體人名均為化名。
- 2 本文所基於的研究屬於「全球社交媒體影響研究」項目的子項。該項目是歐盟研究基金會(ERC)資助，由倫敦大學學院(UCL)人類學系主持的大型社交媒體人類學比較研究(2012年至2017年)，研究同時對全球八個國家(中國、印度、巴西、英國、意大利、土耳其、智利、特立尼達及多巴哥)的九個地區進行為期15個月的田野調查，並在此基礎上理解多元社會與人群在數碼時代的社會關係與傳播形態，以及社交媒體的社會影響。
- 3 2004年農業佔T鎮GDP的89.2%，而2013年，農業的產值已經縮水為12.7%。工業化進程吸收了76%農業用地，取而代之的是61家大型工廠廠區及224家相關公司，數據來自T鎮當地政府統計局。採集時間為2014年6月。

- 4 於1990年代開始學術界將「新生代」農民工作為典型現象進行研究，為保持與之前研究的承繼，本文沿用「新生代」一詞來界定年輕的農村移民。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新生代」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時至今日，先前研究中的「新生代」已經不在代表目前的「新生代」。在2013年《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中》，「新生代」界定為1980年後出生的人群。這一人群中的最長者在2014年田野調查時是34歲。而在T鎮2013年頭胎新生兒的父母平均年齡為23歲（2014年當地統計局數據）。因此許多官方界定的「新生代」已經孕育了更新生的一代。因此，在本研究中的「新生代」更具體的是指16至25歲的農村移民人群。
- 5 84位上海居民成為了研究者的社交媒體聯繫人，其中35人接受了深入訪談。84人的平均年齡為34歲，月平均收入5,000–6,000人民幣；56%女性；教育水平大學本科70%，碩士及以上30%。
- 6 由於T鎮農村移民的高度流動性，在田野調查的15個月間，只有少於25%的受訪對象一直居住並工作在T鎮。
- 7 對核心受訪人與一般受訪人的區分標準是與研究者互動的時間，以及研究者對其社交關係的了解程度。研究者與核心受訪人的平均互動時間為40小時，平均認識/了解受訪者線下關係密切的關係人3人，線上關係密切的關係人4人。這一量化標準並非調查之初確立，而是調查後期的經驗總結。在實踐中研究者對受訪者了解程度的主觀判斷依然是重要標準，這一判斷基於日常互動中研究者對受訪者行為預期的信心與積極的互動反饋。
- 8 這一觀察綜合了當地手機銷售人員（5位）及手機店店主（4位）的日常觀察。
- 9 數據來自對200位前來手機店充值話費或購買手機的農村移民的口頭調查（2014年2月至9月間）。
- 10 調查分別於2013年6月及2014年8月展開，2013年的受訪者為205位農村移民智能手機使用者，2014年的受訪者為119位農村移民智能手機使用者。
- 11 461位受訪者由小鎮居民（377人）與在上海居民（84人）組成。377位小鎮居民均為研究者在線下結識，並在QQ上加為好友的農村移民，其中包括了215位核心受訪者。整體年齡性別與職業分布與上文提及的核心受訪者情況基本類似。
- 12 在全國約70%的農民工與至少一位家人共同居住（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流動人口司，2013）。
- 13 調查以線上問卷的方式於2014年6月展開，238位農村移民與75位當地居民通過社交媒體回答了問題。
- 14 在微信，只能給相互的聯繫人發送信息。如果甲方已刪除乙方為聯繫人，在乙方向甲方發送信息時，系統會提示乙方需要重新添加甲方為聯繫人才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4期(2018)

- 能發送信息。因此，通過群發信息，可以清楚地測出自己是否已經從他人的聯繫人名單中被刪除了。
- 15 2014年6月在上海進行了為期一個月針對中產階級人群社交媒體使用的深入訪談，84人參與了關於「清理聯繫人」的調查。
 - 16 數據搜集於2013年。105位受訪人均為核心受訪人，平均年齡為24歲，女55%，男45%。
 - 17 社交媒體聯繫人分布的這一比較中，上海對照組的有效樣本數目為35人，教育水平大學，收入水平為中等收入，平均年齡33歲。數據收集於2014年6月。
 - 18 數據收集於2013年5月，在90名16–25歲T鎮農村移民中進行(女40%，男60%)。
 - 19 數據收集於2014年3–6月，在100名T鎮農村移民中進行(平均年齡24歲，女46%，男54%)。
 - 20 調查樣本同表三。
 - 21 數據來自對T鎮377名農村移民QQ空間上的7,540張圖的分類統計(2014年7月至9月)。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陳韻博(2010)。〈新一代農民工使用QQ建立的社會網絡分析〉。《國際新聞界》，第8期，頁82–87。
- Chen Yunbo (2010). Xinyidai nongmingong shiyong QQ jianli de shehui wangluo fenxi. *Guoji xinwenjie*, 8, 82–87.
- 陳韻博(2011)。〈新媒體賦權：新生代農民工對QQ的使用與滿足研究〉。《當代青年研究》，第8期，頁24–27。
- Chen Yunbo (2010). Xinmeiti fuquan: Xinchengdai nongmingong dui QQ de shiyong yu manzu yanjiu. *Dangdai qingnian yanjiu*, 8, 24–27.
- 高崇、楊伯澂(2014)。〈地緣情感型信任的衝動、消退及轉向——基於「SZ人在北京」QQ群組的虛擬民族誌研究〉。《中國青年研究》，第1期，頁76–80。
- Gao Chong, Yang Boxu (2014). Diyuan qingganxing xinren de chongdong, xiaotui ji zhuanxiang—jiyu SZ ren zai Beijing QQ qunzu de xuni minzuzhi yanjiu. *Zhongguo qingnian yanjiu*, 1, 76–80.

- 高崇、楊伯澈 (2015)。〈新生代農民工：一群沒有「家鄉」的人——基於對「SZ 人在北京」QQ 群組的虛擬民族誌研究〉。《青年探索》，第 4 期，頁 84–90。
- Gao Chong, Yang Boxu (2015). *Xinshengdai nongmingong: Yiqun meiyou “jiaxiang” de ren—jiyu SZ ren zai Beijing QQ qunzu de xuni minzuzhi yanjiu*. *Qingnian tansuo*, 4, 84–90.
- 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流動人口司 (2013)。《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 2013》。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
- Guojia weisheng he jihua shengyu weiyuanhui liudong renkou (2013). *Zhongguo liudong renkou fazhan baogao 2013*. Beijing: Zhongguo renkou chubanshe.
- 李智、楊子 (2015)。〈女性農民工使用社交媒體調查〉。《現代傳播》，第 12 期，頁 130–134。
- Li Zhi, Yang Zi (2015). *Nvxing nongmingong shiyong shejiao meiti diaocha*. *Xiandai chuanbo*, 12, 130–134.
- 彭蘭 (2009)。〈從社區到社會網絡〉。《國際新聞界》，第 5 期，頁 87–92。
- Peng Lan (2009). *Cong shequ dao shehui wangluo*. *Guoji xinwenjie*, 5, 87–92.
- 田阡 (2012)。〈新媒體的使用與農民工現代化構建——以湖南攸縣籍出租車司機在深圳為例〉。《現代傳播》，第 12 期，頁 28–32。
- Tian Qian (2012). *Xinmeiti de shiyong yu nongmingong xiandaihua goujian—yi Hunan Youxianji chuzuche siji zai Shenzhen weili*. *Xiandai chuanbo*, 12, 28–32.
- 王春光 (1995)。《社會流動和社會重構——京城浙江村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Wang Chunguang (1995). *Shehui liudong he shehui chonggou—jingcheng zhejiangcun yanjiu*. Hangzhou: Zhejiang renmin chubanshe.
- 王春光 (2001)。〈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的社會認同與城鄉融合的關係〉。《社會學研究》，第 3 期，頁 63–76。
- Wang Chunguang (2001). *Xinshengdai nongcun liudong renkou de shehui rentong yu chengxiang ronghe de guanxi*. *Shehuixue yanjiu*, 3, 63–76.
- 王錫苓、李笑欣 (2015)。〈社交媒體使用與身份認同研究——以「皮村」鄉城遷移者為例〉。《現代傳播》，第 6 期，頁 118–124。
- Wang Xiling, Li Xiaoxin (2015). *Shejiao meiti shiyong yu shenfen rentong yanjiu—yi picun xiangcheng qianyizhe weili*. *Xiandai chuanbo*, 6, 118–124.
- 吳麟 (2015)。〈新生代農民工：媒介素養有多高？〉。《中國工人》，第 4 期，頁 43–47。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4期(2018)

- Wu Lin (2015). *Xinshengdai nongmingong: Meijie suyang you duogao? Zhongguo gongren*, 4, 43–47.
- 項飈(2000)。《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上海：三聯書店。
- Xiang Biao (2000). *Kuayue bianjie de shequ: Beijing zhejiangcun de shenghuoshi*.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 鄭松泰(2010)。〈「信息主導」背景下農民工的生存狀態和身份認同〉。《社會學研究》，第2期，頁106–124。
- Zheng Songtai (2010). *Xinxi zhudao beijingxia nongmingong de shengcun zhuangtai he shenfen rentong. Shehuixue yanjiu*, 2, 106–124.
- 鄭欣、王悅(2014)。〈新媒體賦權：新生代農民工就業信息獲取研究〉。《當代傳播》，第2期，頁57–58。
- Zheng Xin, Wang Yue (2014). *Xinmeiti fuquan: Xinshengdai nongmingong jiuye xinxi huoqu yanjiu. Dangdai chuanbo*, 2, 57–58.
- 周葆華、呂舒寧(2011)。〈上海市新生代農民工新媒體使用與評價的實證研究〉。《新聞大學》，第2期，頁150–155。
- Zhou Baohua, Lv Shuning (2011). *Shanghaishi xinshengdai nongmingong xinmeiti shiyong yu pingjia de shizheng yanjiu. Xinwen daxue*, 2, 150–155.
- 鄒超英等(2016)。〈流動人口避孕節育服務現狀與需求調查〉。《齊齊哈爾醫學院學報》，第16期，頁96–97。
- Zou Chaoying etc. (2016). *Liudong renkou biyun jieyu fuwu xianzhuang yu xuqiu diaocha. Qiqiha'er yixueyuan xuebao*, 16, 96–97.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 Anderson, B.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 Barnard, A., & Spencer, J. (Eds.). (2009). *The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London: Routledge.
- Baym, N. (2010). *Personal connections in the digital age*. Cambridge: Polity.
- Bell, S., & Coleman, S. (Eds.). (1999). *The anthropology of friendship*. Oxford: Berg.
- Breslow, H., & Mousoutzanis, A. (Eds.). (2012) *Cybercultures: Mediations of community, culture, politics*. Amsterdam, NY: Rodopi.
- Bucholtz, M. (2002). Youth and cultural practic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1, 525–52.
- Chambers, D. (2013). *Social media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Online intimacies and networked friendship*.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Chan, K. (2013). China, Internal migration. In I. Ness & P. Bellwood (Eds.). *The*

- encyclopedia of global migra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 Chu, W., & Yang, S. (2006). Mobile phones and new migrant workers in a south China village: An initial analysis of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social” and the “technological”. In Pui-lam Law, Leopoldina Fortunato, & Shanhua Yang (Eds.), *New technology in global societies* (pp. 221–245).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 Cocking, D., & Matthews, S. (2000). Unreal friends.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4), 223–31.
- Crapanzano, V. (2004). *Imaginative horizons: An essay in literary-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roll, E. (2006). Conjuring goods, identities, and culture. In Latham et al. (Eds.), *Consuming China: Approaches to cultur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pp. 22–41). London: Routledge.
- Davenport, T., & Beck, J. (2001). *The attention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new currency of business*. Boston, M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 Dennis, A., Poothari, S., & Natarajan, V. (1998). Lessons from the early adopters of web groupware.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14(4), 65–86.
- Fan, C., & Chen, C. (2014). The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In F. Wu, et al. (Eds.), *Rural migration in urban China: Enclaves and transient urbanism* (pp. 17–35).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
- Fang, I.-C. (2011). Growing up and becoming independent: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PhD thesis. London: LSE.
- Fei, X. (1939). *Peasant life in China: 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 New York: Dutton.
- Fernback, J. (2007). Beyond the diluted community concept: A symbolic interactionist perspective on online social relations. *New Media & Society*, 9(1), 49–69.
- Fono, D., & Raynes-Goldie, K. (2006). Hyperfriendship and beyond: friends and social norms on LiveJournal. In M. Consalvo & C. Haythornthwaite (Eds.), *Internet research annual volume 4: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AOIR conference* (pp. 1–47). NY: Peter Lang.
- Fortunati, L., Pertierra, R., & Vincent, J. (2012). *Migration, diaspora,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global societies*. London, NY: Routledge.
- Fried, M. (1969). *Fabric of Chinese society*. NY: Octagon Books.
- Fröding, B., & Peterson, M. (2012). Why virtual friendship is no genuine friendship.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14(3), 201–7.
- Granovetter, M.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1160–80.
- Horst, H., & Miller, D. (Eds.). (2012). *Digital anthropology*. Oxford: Berg publisher.
- Hwang, K.-K. (1987). Face and favour: The Chinese power game.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2(4), 944–74.
- Kipnis, A. (1997). *Producing guanxi: Sentiments, self, and subcultur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 Durham,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傳播與社會學刊》· (總) 第 44 期 (2018)

- Lan, P. (2014). Segmented incorporation: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rural migrants in Shanghai. *The China Quarterly*, 217, 243–65.
- Law, P., & Peng, Y. (2006). The use of mobile phones among migrant workers in southern China. In Law, P., Fortunate, L. & Yang, S. (Eds.). *New technology in global societies* (pp. 245–258).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 Lesser, E., Fontaine, M., & Slusher, J. (2009). *Knowledge and communities*. London: Routledge.
- Li, P., & Tian, F. (2010). The new 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soci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al choices. *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31(3), 1–23.
- Liu, T. (2015). Minority youth, mobile phones and language use: Wa migrant workers' engagements with networked sociality and mobile communication in urban China. *Asian Ethnicity*, 16 (3), 334–352.
- Lin, A., & Tong, A. (2012). Mobile culture of migrant workers in southern China: Informal literacies in the negotiation of (new) social relations of the new working women. In P. Law, (Ed.), *New connectivities in China: Virtual, actual and local interactions* (pp. 81–94). London, NY: Springer.
- Madianou, M., & Miller, D. (2012). *Migration and New Media*. London: Routledge.
- Mann, S. (2000). The male bond in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5(5), 1600–14.
- Markham, A. (1998). *Life online: Researching real experience in virtual space*. Plymouth: AltaMira Press.
- Miller, D., & Horst, H. (2006). *The cell phone*. Oxford: Polity Press.
- Miller, D. et al. (2016). *How the world changed social media*. London: UCL Press.
- Misa, T., Brey, P., & Feenberg, A. (Eds.). (2004). *Modernity and technology*. MA: The MIT Press.
- Minar, D., & Greer, S. (2007[1969]).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Chicago, IL: Aldine.
- Murphy, R. (2004). Turning peasants into modern Chinese citizens: “Population quality” discours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primary education. *The China Quarterly*, 177, 1–20.
-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2016). China's economy realized a moderate but stable and sound growth in 2015. Retrieved from http://www.stats.gov.cn/english/PressRelease/201601/t20160119_1306072.html.
- Nee, V., & Ingram, P. (1998). Embeddedness and beyond: Institutions, exchange,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M. Brinton V. & Nee (Eds.),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sociology* (pp. 19–45). NY: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 Ngan, R., & Ma, S. (2008). The relationship of mobile technology to job mobility in China's Pearl River delta. *Knowledge, Technology, and Policy*, 21(2), 55–63.
- Oreglia, E. (2014). ICT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 in rural China.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0 (3), 19–30.
- Peacock, J. (1968). *Rites of modernization, symbolic and social aspects of Indonesian proletarian drama*.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Peng, Y. (2012). Internet use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In P. Law (Ed.), *New connectivities in China: Virtual, actual and local interactions* (pp. 95–104). London, NY: Springer.
- Putnam, R.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Y: Simon & Schuster.
- Qiu, J. (2009). *Working-class network society: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information have-less in urban China*.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Radcliffe-Brown, A. (1940).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 primitive society*. London: Cohen and West.
- Rainie, L., & Wellman, B. (2012). *Networked: The new social operating system*. MA: The MIT Press.
- Rheingold, H. (1993). *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Ridings, C., Gefen, D., & Arinze, B. (2002). Some antecedents and effects of trust in virtual communities.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 11(3), 271–95.
- Rofel, L. (1999). *Other modernities: Gendered yearnings in China after socialism*.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uan, D. (1993). Interpersonal networks and workplace controls in urban China.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9, 89–105.
- Saunders, D. (2010). *Arrival city: The final migration and our next world*. Toronto: Knopf Canada.
- Skinner, G. (1964).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 I.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1), 3–43.
- Smart, A. (1999). Expressions of interest: Friendship and *guanxi* in Chinese societies. In S. Bell & S. Coleman (Eds.), *The anthropology of friendship* (pp. 119–137). Oxford: Berg.
- Turkle, S. (2011). *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 NY: Basic Books.
- Wallis, C. (2013). *Technomobility in China: Young migrant women and mobile phones*. NY,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Walther, J., & boyd, S. (2002). Attraction to computer-mediated social support. In C. Lin & D. Atkin (Ed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udience adoption and use* (pp. 153–188).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 Wang, X. (2016). *Social media in industrial China*. London: UCL Press.
- Wellman, B. (1988). Structural analysis: From method and metaphor to theory and substance. In B. Wellman & S. Berkowitz (Eds.), *Social structures: A network approach* (pp.16–6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ellman, B. (1999). *Networks in the global village: Life in contemporary communitie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White, M., & Dorman, S. (2001). Receiving social support online: implications for health education. *Health Educ Res*, 16(6), 693–707.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44期(2018)

- Wu, F. et al., (Eds.). (2014). *Rural migration in urban China: Enclaves and transient urbanism*. NY, London: Routledge.
- Yang, K. (2012).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use of mobile phones amongst migrant workers in Beijing. In Law, P.-L. (Ed.). *New connectivities in China: Virtual, actual and local interactions* (pp. 67–80). London, NY: Springer.
- Yang, G. (2009). The Internet as cultural form: Technology and the human condition in China. *Knowledge, Technology & Policy*, 22(2), 109–115.

本文引用格式

王心遠 (2018)。〈流動生活中的線上社區：中國新生代農村移民社交媒體使用的人類學研究〉。《傳播與社會學刊》，第44期，頁151–180。